

论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特征

邓 姿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 丘东平以尽量接近生活原生态的叙事内容及对生活实录式的叙述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战的文本, 这些抗战文本从亲历战争的典型经验、以“人”为本的叙事策略、浓郁文人情怀的书面语言等几个方面构成了鲜明的纪实小说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 文体特征; 典型经验; 文人情怀; 书面语言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4-0086-04

文学作品的生命从来都羈系于个别性, 这种个别性既体现在内容的涵容量与表现生活的深刻性上, 也体现在作品的文体特征上, “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 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1]。文体特征所包蕴的是使文学作品得以呈现某种艺术风格、艺术趣旨的最原生的基质, 同时它也是一个作家的文学理念和审美追求的某种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分析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特征对全面解读丘东平创作的无限开放性和多重可能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丘东平,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也许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略知一二。他的过早离世, 他小说的异质性, 他所属的七月派“被贬抑、被排斥、被抹煞”的历史事实, 导致了他在潮起潮落的世俗喧嚣中, 被冷落乃至遗忘。事实上, 对他的忽略, 将会使我们对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而且缺失的是一份极有意味、深刻的理解。笔者检索了仅有的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及一些零散的学术片段,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关于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 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有人说是报告文学, “东平独创了全新的报告文学体式”^[2]; “丘东平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等, ……可说是革命战士的鲜血凝成的不朽篇章”^[3]; 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等, 都是描写东战场的较好的报告作品。”^[4]有人认为是战地特写,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这些“以淞沪抗战为背景的战地报告是七月派作家蘸着自己鲜红的血在战地焦土上涂抹出来的文字”^[5]; 也有人认为丘东平“不少作品像报告文学, 战斗速写, 又可看

作小说”; “《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是报告文学和小说混杂的作品”^[6]; “《第七连》在《七月》杂志发表时, 列为‘阵地特写’, 后因胡风用作东平小说集的名字, 人们一般以小说视之”^[7]¹⁶⁹。到底是报告文学, 特写, 还是小说? 面对问题, 最好是具体的探讨和对话, 而不是笼统的结论。通过对丘东平抗战文本的仔细阅读, 笔者以为丘东平开创了现代小说一个新的创作路径——纪实小说。

1999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给“纪实小说”下定义: “运用小说的戏剧性讲述的真人真事的故事”, 以此来界定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 是十分恰当的: 一是丘东平以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 取材真人真事, 迅速快捷地描绘了抗战的惨烈和艰苦卓绝, 记录了战争的进程, 作品以其强烈的鼓动性、快捷性与生动性, 在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民族义愤、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斗争信念等方面发挥了它应有的功利价值和新闻作用; 另一方面丘东平的抗战文本又以创作虚构小说的技巧与手法, 如以“人”为本的叙事策略、颇具文人情怀的书面语言等等, 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进行创造性的处理, 他通过重新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 并将其纳入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参照, 表现出作者文学探索一定程度上的另类性和深度意义。

一 亲历战争的典型经验

丘东平“是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最早的带枪的文艺战士”^[8], 当左翼文人们还在“革命+恋爱”的梦呓中张扬澎湃的革命激情时, 他早已作为战争的参与者驰骋疆场。他少年时代就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 1932年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战役, 作为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

[收稿日期] 2009-06-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编号: 08W021)

[作者简介] 邓姿(1971-), 女, 湖南双峰人,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的秘书,丘东平随军战斗在闸北阵地,坚守在吴淞炮台。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丘东平到武汉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春,他随新四军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参加过新四军的丹阳之战、延陵之战、珥陵之战等战役,1941年,他在苏北盐城地区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时,在一次反扫荡战中为指挥学生安全撤退英勇牺牲。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丘东平,从自己真实而独特的战争经验出发,以尽量接近生活原生态的叙事内容及对生活实录式的叙述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战的作品,如《给予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茅山下》等,这些作品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这一段激荡人心的真实历史,体现出时代的疾风骤雨和人民的情绪意志。

《第七连》和《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是描写上海保卫战的两篇纪实小说,这两篇小说分别有副标题“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作品采用口述实录的第一人称方式,随着主人公的独白,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弥漫的硝烟、闪光的炸弹、呼啸的子弹,摧毁着一切,生命在战场如同草芥,战士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第七连》)。江阴炮台的战士们激战七天,百分之九十五阵亡,两个营最后只剩下四十六人。在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中,作者以充塞天地的忧患,把人的心理弱点和战争的残酷性,把人的七情六欲和逐渐萌发的必死的意志搅合在一起,产生某种原色原味的真实感。《给予者》是反映“一·二八”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一部全景式的作品。作者有感于某大学女教授捐款给政府,由报馆转交,以获得爱国名声的新闻事件,在《给予者》中塑造了黄伯祥这样一个不求索取,连亲人也奉献了的“给予者”形象,表现了爱国军人保家卫国强烈的民族情绪。黄伯祥所在的十九路军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是这支队伍打响了“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第一枪,后来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八·一三”前夕又奉命调回上海抗战。小说中十九路军曲折坎坷的命运,正是历史上十九路军的真实写照,黄伯祥所看到的旧军队军官们骄纵野蛮、虐待士兵、残杀农民的行径,也是作者在十九路军中的体验和感受。就连小说中那间毁于战火的小杂货店,也是东平把自家在香港开设的,移给上海的主人公。《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借一个难民W女士的口,把“八·一三”惨绝人寰的战斗实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八月十三日,三千多日军陆战队员,霎时把整个上海变成了一个死的荒冢,炮火纷飞,硝烟弥漫,日本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淫,作者没有回避残酷的现实,真实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无边痛楚和灾难景象。我们不仅看到了血,看到了泪,听到了反抗的呼喊,而且看到了中华民族“不死的灵魂”。这样的描写,不仅当年曾激起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就是在今天,我们在重温历史的狼烟和血泪的同时,还能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校副官》反映的是1933年的华北抗战,以中校副官为代表的军人有强烈的爱国战斗要求,但上层军官却执行着不抵抗的

命令,迫害中下层官兵的爱国行动,又将他们的战绩窃为己有,揭示了国民党军人面对日寇侵略的不同面貌。《友军的营长》反映国民党抗日军队僵死教条的管理,营长在寡不敌众时主动撤退,却以丢失阵地罪被判死刑。《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和《漂武路的故事》谴责国民党顽固分子对新四军的迫害,展示了他们在大敌当前却兄弟相煎的反动的一面。很显然,在作者后期的几篇作品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反对派已经开始对共产党零星地下毒手了,在作者死后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亲历的典型经验使丘东平的抗战文本具有非常强烈的纪实特征,这个“纪实”还不仅仅是平常所说的现实主义态度,而是在取材方面写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丘东平力求真实地将战时的信息、战场上的硝烟烽火传达到人民中间,力求真实地再现战争的原貌,力求给读者逼近现场的真实感觉。但是,作者避免对事件作记录性的平铺直叙,否则也就和“前线主义”差不多了。丘东平在尽量保证生活基本真实的基础上,调动一切虚构小说的表现手法,突出写人,且直追人物的心灵世界,展现出在战火中奋然崛起的人性光辉和灵魂颤动,使抗战文本显示出小说的生动性、具体性的特点。

二 以“人”为本的叙事策略

胡风曾说“文艺作品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图解或通俗演义,它的对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状态,活人的精神斗争。”^[9]但处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抗战文学,很容易将政治主题和战争背后的政治利益作为最高诉求,过分注重对前线战事和政治主题的阐释而忽视了战争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缺少对人物性格的精雕细刻。茅盾曾一再批评抗战文学只“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场面的描写”,而出现“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10]。有的抗战文学即便写人物也是有意设置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阵营,一边是代表正义理性的我方,一边是代表兽行邪恶的敌方,呈现出英雄化——魔鬼化二元对立的模式。而丘东平的抗战文本不仅描摹壮烈的场面,还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为描写中心^[11],将他们置于各种复杂的矛盾之中,让他们的心灵在血与火的炼狱里忍受各种力量的撕扯,展现出战争背景下人物的隐秘的深层心理与生命本能的微妙复杂性。

在丘东平的抗战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具有牺牲精神和冲天豪气的英雄形象。如义无反顾带领连队奔赴战场,在炮声隆隆的战场置上级要他坚守阵地的命令于脑后而主动迎击日军,经过浴血奋战取得胜利,最后却被营长以违反军纪的罪名枪决了的林青史(《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以死谏战、视国家民族利益甚于个人生命的爱国中校副官(《中校副官》);下令炮手向自家杂货店开炮,让父母妻儿和日军同归于尽,不求索取、连亲人也奉献了的“给予者”黄伯祥(《给予者》);毫无畏惧攀附着敌人坦克车的蚕轮,用驳壳枪对着车上的展望孔射击,而卒至给蚕轮带进了车底,辗成肉酱的排长蒋秀(《第七连》)等等。读者于浓重的悲壮氛围中感受到的是他们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看到的是中华儿女怎样用血肉之躯筑起御敌卫国的坚固长城。不过,丘东平笔下

的这些英雄并非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十全十美的英雄,他们在成为英雄的过程中,都得经受炼狱一般的心灵磨难,他们得不断地和与生俱来的个人意识、个性缺陷、心理弱点、情欲冲突做着艰难的搏斗,逐渐变得意志坚强、人格完善。在丘东平笔下,人在身处以个体生命的毁灭为动力或代价的战争中时,恐怖、焦虑成为自然而然的心理状态。因为生命对于人们来说只有一次,而且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有强烈的求生渴望和趋利避害的欲望,而战争却是残酷的,随时会剥夺人的生命,它的狰狞面目常常会带给人恐惧。《中校副官》中年轻的勤务兵被炸弹的巨响吓得躲进了粮服部的仓库里,身上用五张棉被盖着。林青史在面对残酷的战争时,也意识到“战斗……每每使我胆寒,我真不敢对着它正视,我承认我直到今日还是弄不清楚,正好比我迷在梦中”(《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这种描写最有力度的应是《第七连》,主人公丘俊作为连长被紧急派往前线,他在理智上非常清楚,自己必须为国赴死,但在情感、心理上,他却难以排解自己内心对于战争的恐惧,“一种不必要的情感牵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这时候必须战斗外,对于战斗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这使我觉得惊异,我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中最胆怯的一个。我是否能够在火线上作起战来呢?我时时对自己这样考验着”。他的理智与情感激烈地对峙着,从理智出发,他不断地考验自己,强迫自己去承受因战争而来的恐惧,严格防范自己心中那些对战争有妨碍的感情。在行军途中,他看到队伍前头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穿绿袍子的女人,他便抓紧让自己的队伍停下来,以避免女人会引动他想起“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这种描写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感性的人的存在,他承认自己的“情欲”,又压抑着这种会削弱斗志的“情欲”。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他甚至毁掉留声机的胶片,“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从肉体到灵魂,丘俊对自我实行残酷的锤炼。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虽然恐怖时常会占据他的灵魂,可贵的是他在战火中能够由惶恐趋于平静,进而鼓起与阵地共存亡的勇气,决心“以身许给战争”,实现自己人格的升华。丘东平用精到的笔触写出了英雄们怯弱中的勇敢,绝望中的希望,动摇中的坚韧,正如苏联作家邦达列夫所说:“一个人在战争中没有体验过包括自己和死亡威胁在内的正常感情,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一个人能够战胜恐惧感,能够表现出平时的勇敢精神,在这里我看到了英雄本色”^[12]。丘东平给我们展现的,不是概念化、平面化的人物,而是一个个充满情绪波动、人性矛盾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这样的形象,让我们感觉更真实、更生动,也更具有震撼力。

丘东平在《茅山下》中借周俊的口吻表达过自己的人物塑造倾向:“我追慕着一种时代的典型,我赞许那样的斗争者:他是那样的满身创疤,他带着随胜利以俱来的严重的疲乏,他以杜斯退夫斯基式的长而踉跄的黑影的出现”。东平在创作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明暗交织,超脱善恶法则,并显示着英雄主义的光彩,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廊中一组奇特而刚烈的形

象。

三 浓郁文人情怀的书面语言

汪曾祺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3]从审美的观点看,文学是形式化了的语言艺术,而文体又是形式化的重要标志,所以语言是认识小说文体特征的重要切入点。

抗战时期文坛上的作家们都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追求,希望和广大民众高唱时代的进行曲,所以语言的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丘东平抗战文本的语言却以一种区别于主流话语的陌生化的面孔出现在读者面前,具有浓郁的文人书面语特征。他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欧化的复合式长句,句中多用定语、状语,在用词方面,他对形容词、形容词化名词情有独钟,大量应用书面语言和抽象的修饰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人语气和语调占据主流地位。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和七月派的理论倡导是分不开的。七月派的精神领袖胡风是极少数的对语言的惯性力量有着敏感和警惕,并试图寻求突破的途径,进而创造词语新的精神指向和想象边界的一个作家。在他的倡导下,七月派作家从丘东平到路翎,从吕荧到阿垅,他们惯用的概念、范畴如“主观战斗精神”、“原始生命强力”、“精神奴役创伤”、“突入”、“肉搏”等,无论是相对日常的生活语言,还是相对于文坛上流行的主流语言,都显得另类而别具一格。他们的写作,更是一场语言的自我搏斗,一次词学上的内心辨析,他们很少采用那种静静流淌的抒情性语言,而是高举激情的重锤将语言像楔子一样夯入读者的头脑,以此来寻求语言最大限度的“张力”,收获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惊讶和发现。如:

(1)他的坚决、严肃而带有怒意的面孔说明他绝对地不是可以在别人的戏玩、奴役,以及一切的淹没中让自己无踪无迹地沉寂下来的一个人。《给予者》

(2)周俊开始懂得对一个人抱着一种高傲和轻视,从这高傲和轻视中他感到一种新鲜无比的快乐,用光耀的傲慢的目光居高临下地去俯瞰一个人的灵魂,而对他加以透视,这使他发生出一种愉快的残孽的心理来。《茅山下》

(3)暴风雨,在它无限制的力的行使中似乎还蕴蓄着不能排解的悲愤,为了胜利而发出惊叹和怒鸣,用悲哀的调子在歌赞强健、美丽的自己……《暴风雨的一天》

繁复的定语、相近或相同意义语词的不断重复或迭加,这种浓墨重彩的语言具有强烈的书面语以及文人语言特征,这种语言形态基本上承续了“五四”时期的所谓“智识阶级语言”的特征,杂有部分西方外来情绪,“披着欧洲外衣”,因而这种语言被认为“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14],这种语言是作家介入社会生活的言说方式,它不去或较少地去关注对象的话语方式,而集中笔力张扬作家的自我意识,便于传达作家的深刻的社会关怀或自我批判精神,在中国20世纪特定的历史情势中,这种语言形态曾经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

丘东平还擅长通过不谐和的语法搭配,违反逻辑的奇特修饰,使一些很平常的意象获得新的美学意义和哲学色彩,给读者一种巨大的惊奇感,一种猝不及防的冲击力。所以郭

沫若曾评价:“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实的交织,虽然煞费了苦心,但不怎样显露苦心的痕迹。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15]如:

(1)夜已经深了,上弦月象一把镰刀似的挂着,泛着古旧的黄金的色调。(《茅山下》)

(2)周俊垂着头,尽力使上身向前倾斜,沉重的包裹象一个怪物似的用痛苦的爪捕捉着他长而驼的肩背,叫他的身体无可奈何地、空洞地在空间里发出剧烈的捣动。(《给予者》)

(3)那坚苦、沉郁的灵魂象一个茫无涯际,白雪一片的凛冽的严冬。(《给予者》)

一切都逸出了常规,也偏离了语法,让读者感到奇突与生涩。但是,这不仅没有封闭语言的本性,反而向我们敞开了语言深处的新的可能性。正是这些新奇、拗口的文字构成了丘东平抗战文本语言的难以复制的创造性。正如杨义所描绘:“作家不喜欢用轻倩婉转的语言去修饰生活,而喜欢选择具有特殊的色调、声响、质感,因而能撩拨人们的感应神经的意象,对环境和人物感受作一种出语惊人的比喻,从而使行文在悲郁的叙事中混杂着骚动不安的抒情,在几分散文诗化的艺术处理中,形成一股色味浓重,令人悲慨不已的抒写浊流”^[7]。

[参考文献]

[1] 王 蒙. <文学学丛书>序言[M] /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1.
[2] 周燕芬. 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37

[3] 张龙福. 在民族的旗帜下呐喊奋进——片谈抗战时期作家与文学的战斗风采[J]. 青大师范学院学报, 1995(3): 78
[4] 叶志良. 穿行烽烟: 战时东南报告文学散论[J]. 浙江师大学报, . 1994(5): 34
[5] 刘开明. “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七月派小说的主题意蕴[J]. 东岳论丛, 1996(5): 94
[6] 李 槟. 一座晶钢的雕像——论丘东平和他的创作[J]. 河北学刊, 1998(6): 87.
[7] 杨 义. 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下):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8] 杨淑贤. 论丘东平的报告文学[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1984(4): 68
[9] 胡 风. 人生·文艺·文艺批评[M] / 胡风全集: 第3卷.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97
[10] 茅 盾. 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J]. 文艺阵地, 1938 1(9).
[11] 胡 风. <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M] / 胡风全集: 第3卷.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167.
[12]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M]. 北京: 北师大出版社, 1984 325
[13] 汪曾祺.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M] / 汪曾祺全集: 第4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83
[14] 本杰明·史华慈. <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M] // 五四: 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9.
[15] 郭沫若. 东平的眉目[M] / 沉郁的梅岭城.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3

On Stylistic Features of Qiu Dongping's Articles about Anti-Japanese War

DENG ZI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Trying his best to approach the original ecology of life, Qiu Dongping writes a series of texts about Anti-Japanese War by recording and describing the real life. These texts about Anti-Japanese War reflect a distinct stylistic features which consists of the typically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battlefield, the narrative strategy based on "person", written languages which are rich in strong literator feelings and so on.

Key word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experience; literator feelings; written language